

《北大讲座》编委会 编

北大讲座

精华集

(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讲座 精华集 (文化)

《北大讲座》编委会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讲座精华集. 文化/《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1-25250-5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社会科学—中国—文集②自然科学—中国—文集③文化—文集 IV. ①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7217 号

书 名: 北大讲座精华集(文化)

著作责任者: 《北大讲座》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250-5/G · 392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1766262377@qq.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2.25 印张 395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7.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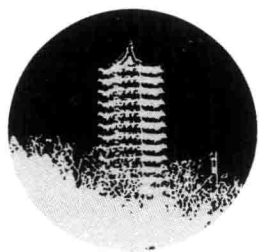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北大讲座

季羨林



《北大讲座》编委会

主 任：王恩哥

副 主 任：叶静漪

成员单位：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
北京大学教务部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精华集)编委会

主 编:阮 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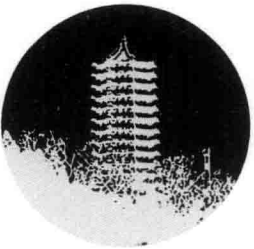
副 主 编:路姜男

执行主编:黄 冠

执行副主编:魏钰明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贵 驰	曹定铎	陈冠宇	陈 嘉
陈震鹏	郭孟曦	郝凌瑶	何孟奇
洪蔚琳	蒋锡泰	金雅昭	黎钧宇
黎 泉	李 昶	李 琬	李曦纳
李孝严	李 臻	刘龚熠	马 琳
马瑞娟	孙若男	孙甜甜	孙 伟
汤晓路	王靖雯	王卓汝	温倩倩
肖天祯	肖 遥	熊文雪	徐梓岚
燕宇飞	闫雅心	杨悦辰	伊 诺
张进鑫	周宏露		



目 录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略论	1
辜正坤/从中西文明比较看中国的崛起	23
辜正坤/从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看中西文化精神	35
辜正坤/中西价值观的渊源与比较	
——家一国一天下	60
楼宇烈/正确认识佛教	77
楼宇烈/禅与生命体悟	86
楼宇烈/中医与传统文化	96
朱孝远/诗、音乐和国民性	
——路德改教的日耳曼传统	107
朱孝远/人文主义和人的复兴	116
谷振诣/推理的声音	
——批判性思维	128
彭 林/呼唤礼仪回归 传承文化之魂	
——传统礼仪文化与现代社会	145
何光沪/爱与存在	156
张祥龙/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危与出路	178
杨立华/孟子人性论	203
李湘雅/解读《道德经》	221
韩林合/浅论哲学经典的解释问题	
——以《庄子》的解释为例	232
张尚德/《中庸》思想系统的开展	242
唐代兴/漫谈文化软实力	265
樊 浩/儒、道、佛三位一体与中国人的文化精神结构	280
卢晖临/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儒家文化的命运	
——兼评“五四”	295
李四龙/缘起思想与禅法	306
陈峰君/印度宗教与现代化	322

中西文化比较略论

辜正坤

[演讲者小传]

辜正坤,男,1951年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获国务院颁发有特殊贡献专家称号,历任北京大学文化文学与翻译研究学会会长,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协会会长(双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英文版《中西文化比较》(欧洲版)(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a and the West)杂志主编,商务印书馆《英语世界》杂志顾问等。曾兼任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美国瓦西塔大学客座教授和北京东方神州书画院一级书画师。曾获北京大学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研究方向:莎士比亚、中西文化比较、诗歌鉴赏与翻译学。著、译、编、校著作47余种,发表论文150余篇。代表性理论专著有:《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中西文化比较导论》《莎士比亚研究》(英文版)等。代表性译著有英译本《老子道德经》《毛泽东诗词》《元曲一百五十首》《易经》及汉译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等。曾任国家十一五重点科研项目“外国古代神话和史诗研究”课题总主持人(已结项)。曾多次应邀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作学术讲座。

今天这个讲座,我想应该是普及性的,因此我就把关于中西文化比较最关键的地方,做一个粗线条的介绍,让大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有一个大致的看法。

要讲中西文化,首先就得讲讲文化的定义。那什么是文化呢?关于文化的概念,有人统计过,至少不下于180多种。今天不可能去一一探讨它们。根据我的理解,我所使用的文化概念跟别人使用的有所不同。我认为,文化可以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我今天要用的这个文化在定义上主要是广义的文化,我给它下的定义是: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这样一来,文化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

请大家顺着我的思路来理解文化的概念,那么就容易明白我是如何来做中西文化的宏观比较的。

第二点,讲到文化我还要谈谈文化是受哪些因素驱动的,有没有一些因素,导致文化的总的方向受到制约呢?当然有的。有各式各样的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因素系统。从纯理论上讲,这些因素可能是无穷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无穷的因素中压缩提取出一些主要的因素。我把它们概括成九大因素。这九大因素分为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哲理的四组,也就是:(1)生态、环境、横向决定律;(2)语言、文字纵向诱导暗示律;(3)科技、工具、媒介横向催变律;(4)物欲原动力律;(5)情欲原动力律;(6)权欲原动力律;(7)审美递增、递减律;(8)阴阳两极对立转化律;(9)万物五相(行)选择律。一共有这么九大因素,它们会导致文化在不同的层面上发展。今天不可能把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因素都进行阐述,我只能侧重其中的一点,或者两点,以之作为一个汇通点,把其他的层面连贯起来讲。比方说,我可以从地理环境入手来展开这个话题,然后再把它横向拉开,引入其他话题。

其次,我还要提出一个万物自协调理论观点。万物都是具有自协调、自组织特性的。万事万物只要被赋予一个简单的力以后,不管把它放在哪个地方,它都会和周围的东西产生一种关系。这就如一杯水,如果你把它泼到地上,它就会依据一种力的作用向四面八方渗透,或者是遇到一种阻碍暂时停顿下来,或者是突破阻碍继续渗透。总之,在最后你就会发现它是一种不规则的形状,这个形状就是和周围的事物相关、互动而构成的一种形状。这个形状就很类似于文化的形状。人类的文化是可以自我协调、自我组织、自我规范、自我节律、自我适应的。它在诸多互动、互构的因素网络中一定要找到一种最好的存在方式。这个观念和生态学的观念是相通的。任何一个东西,它的任何一个

因素被改变后,就往往发生一系列的相应改变。任何一个东西被放到一个环境里去以后,就会和周围的环境产生一种协调的关系。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没有一种文化不是合理的,这也说明没有一个文化不是好的。依据它适应周围的条件而言,它肯定是最好的。换一种角度来说,如果文化换一个环境,它的渗透方式也就会发生改变,发生改变以后,它也是最好的,至少相对于它所依存的环境,它是好的。这也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一种变相说法。

那么,中国文化是怎样自己加以协调的呢?西方文化又是怎样自我协调的呢?就是说它找到了怎样的一种形状或者模式使它们处于一种最好的状态呢?这正好是要讲中西文化比较之前要说清楚的。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怎样自己协调的。要讲清楚这一点,就必然会讲到中国文化所产生的这个地理环境。而地理环境中最关键的因素则又是它的气候条件和资源条件。尤其是气候条件,它可以说明一切生命都依赖于它。在特定的时期和条件下,不仅生命的发展程度依赖于它,和生命相关的一切行为和现象,例如文化现象,也往往依赖于它。当地球的气候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相应的文化也就会相应发生一种比较大的变化。举例来说,根据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大约距今一万年,地球的第四冰期到达了尾声,地球表面温度开始慢慢地上升。到了距今五千年前后,地表的温度普遍转暖。这样一种气候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化效应呢?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世界各个地方的文化,都基本上适应这种条件而作出了相应的变化和反应。这个变化、反应的结果,就是在温带,在亚热带,例如北纬35度到40度这个地带,首先发展出了人类早期最辉煌的文化,例如地中海文化,包括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等等。也就是说,到五千年前后,人类到此为止最辉煌的文化差不多都在那个时候相继产生。这不能以偶然性来解释它。实际情况是,只要我们所在的地球给出了生命、生活、文化所必需的基本的相关条件,各种相关因素一旦不同程度地汇集到一起,就会产生互动、互构活动,产生种种协调、适应、组织现象,促成种种演化,于是文化、文明就在这样一个条件下繁衍生发开来了。大体上说来,五千年前后的文化,在这个纬度上发展得最辉煌。这首先是和它所处的气候条件相关的。

说到中国,情形就更是这样。我们经常讲华夏五千年文化,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古代文化也确实是在那个时候忽然间发展得最好、最快。为什么那时候中国的文化发展得最好呢?竺可桢先生曾经把中国五千年的气候波动画了一个曲线图,学者们认为这个图是相当客观的测定。依据相应的气候的变化,人们就可以找到相对的文化的缩影。种种研究表明,一旦一个地方突然变得很冷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也往往容易发生改朝换代的情形,也往往同

时伴随着大饥荒,频繁的干旱、水灾等等。而当文化比较辉煌的时候,往往都是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经常是这样的。例如当商朝要灭亡的时候,气温就突然降低了。唐朝兴旺发达的时候,气温就总是比较高,并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气温变化会发现,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会同时发生和气温相应的波动现象,这是非常有趣的。有人会觉得很奇怪,事实上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因为一种物质条件的变动有可能导致相关的物质现象的变动,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什么时候容易出乱子呢?显然首先是人们没有粮食吃的时候。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一般都是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因为气温一低,农作物就长不好,会相伴有很多灾害,战争也往往会随之发生。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迫于相似的恶劣的气候条件而不得不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这时也就会容易趁着当时中国内部苦于天灾人祸的时机攻打中原,并且常常得手,对中国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因此,古代中国文化在若干方面的起伏状态都是必然的,并且往往呈一种循环态势。这就颇类似白昼和黑夜、日和月的循环现象。当然,人类文化和自然现象毕竟是不同的,因为人类文化有一个自我累积并抵制淘汰的内在特性。但是总的说来,地球——甚而至于整个宇宙——它本身的发展就是循环的,因此人类的文化从宏观的走势来看,当人类自身对环境条件的干预能力较弱的时候,其早期发展也就必然具有循环性。如果只是以几十年为周期来看,这种循环现象可能不容易发现,但是像中国这么长的未曾中断过的以千年计的历史过程,就很容易让人们发现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所以,中国的文化就是依据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相关的种种历史因素相应地不断发展、演化,一直到现代。这样来解释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原理,就比较简单明了。当然,还可以用其他的许多观点来作出不同程度的解释,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讨论它们了。

更进一步地具体来说,为什么基本相同的气候条件下,中国的文化又会发展得和西方的文化不一样呢?是什么东西使它们发展得不一样了?

首先,我们还是从气候差别来看这个问题。古代中国的最北方是很冷的,不太适合于文化的发展。而南方按理气温高,应该适合文化的发展了。但也不尽然。因为古代南方的气候不是现在这样的。最关键的是,当时南方的土地是非常贫瘠的,排灌系统落后,其土壤跟现在不一样,根本不适合农作物生长。根据专家的研究,从远古的时代起,中国北方的西伯利亚寒流不断地向南方移动,在经过蒙古大沙漠的时候,风力把细沙卷了起来,夹裹着飞扬,但是当到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一带时,由于风力不支,沙尘慢慢地又降了下来,经过长期的一个过程就在中原一带形成了约莫150多米厚的土壤层,这层土壤是

非常肥沃的。此外,如果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它以西和以东的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以东的中国的氣候比较湿润,雨量充沛,因此在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就更加适合于农耕。这样一种环境气候条件就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它是自然产生的。它的这种生产方式和西方很多国家的生产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农耕使得中国人可以长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这叫安居乐业。而游牧民族就不行,当一个地方的草被吃完了以后,就必须再换一个地方。这种生存条件导致一种流动的生活形态,因此西方古代社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往往趋向于流动的生活方式。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西方的地理气候条件不是很适合农耕,比如地中海一带,就非常贫瘠,地中海本身也很贫瘠,连鱼都不产。但是为什么它这种条件同样能产生非常辉煌的文化呢?这是因为它的地理气候条件提供了另一种潜力。比如说,地中海的航路、航海业就非常的发达。航路的发达使得商业就逐渐的兴盛起来。有了船,就可以四通八达。因此地中海周围的文化也是非常发达的,比如古希腊、罗马、古埃及等都在这一带。反观中国,既然可以安居在一个地方,就少受迁徙流离之苦,而这种长时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得中国的家族发展得很快,所以中国的家族往往都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中原一带。百姓,百姓,一个姓就是一大家族,其实岂止一百个姓?一旦安居乐业起来,往往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起来。所以中国的文化就其整体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更趋向于是一种静态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更趋向于是一种动态的文化。这样一来,中国文化中与静态特点相关的一切就更容易得到鼓励而蓬勃发展起来。

有人常问中国的宗法制、家长制为什么这么严重呢?严重二字具有一种贬义。其实它不是严不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是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而产生的结果,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最佳的文化果实。如果相反,它就绝难有后来积累而成的辉煌文化成果,很可能整个国家跟欧洲一样,至今四分五裂。这就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文化是如何具有自协调性的。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的流动性的文化,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促使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发展得非常的充分。这种自由主义得力于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这也就是西方商业很发达的一个原因。这正是西方文化自协调的重要表现。所以中西方文化都是依据具体的先天的自然条件及后天的人性因素而互动互构发展起来的。不同的客观条件模塑了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也是东西方文化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然,顺便提一句,我们这里谈环境谈得较多,但绝不是说环境就决定了

一切,因为环境毕竟是横向性决定因素多一些,纵向性因素相对少一些。实际上决定文化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因为以环境因素作为主要讲话契机,自然就要谈得多一些。

从地理环境我们可以追踪到一些文化发展的线索,当然不完全对应得那么紧密。现在我们进而谈谈中国在这种环境制约条件下会有些什么独特的文化现象。首先,如果这种条件下的民族安居乐业,老是相对久远地住在同一个地方,它的家族就容易繁衍起来,一代又一代连锁式地滋生,因为它所栖息的土地可以不断再生所需要的生存资料。结果这个家族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人口数量越来越庞大,其相应的家族纽带也越来越繁复体系化,人际关系网越来越大,在这种条件下,谁来处理人际关系呢?或者说,谁来当首领比较合适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的部落、家族强行挤入的话,既然大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论起来实际上就都是一家子,只不过慢慢地由于年代久远了,相互之间的亲戚关系、血缘关系不是那么亲密,但归根结底还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在一家人当中矛盾该怎么处理?你不可能借外来人处理,帮有帮规,族有族规,自家的事情只能自家处理。那么听谁的,听来听去肯定只好听父母的、听年长者的话。这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尊老及相应而来的祭祖现象必然要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也就是说,所谓的家族观念,所谓的宗法制这些东西,它一定就要这么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形成方式孳生了中国式国家的形成方式。这若干的家族不断地繁衍,繁衍成越来越大的家,家大到最后就变成了国了,所以叫家国。国和家,家和国都是在一个规模上的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家国主义,它有这么明显,这么根深蒂固。我不是在暗示家国主义就一定是坏的,恰恰相反,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主义就其所处时代的自律形式而言,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机制。它非常符合它自身的生存条件,它和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模式是完全呼应的。进而言之,中国社会中的与此相应的伦理、政治、经济、艺术、哲学,种种制度、思想也跟随着以相似的模式发展起来。比方从伦理方面来说,既然大家都是一家子,就不应该争斗。不是说中国人不会去争斗,因为人的天性中存在着一种争强好胜的权欲,但是争斗的程度是有差别的,至少为适应这种具体的人际关系,就会产生出一种理论来,压抑这种争斗的思想,例如“和为贵”的思想。什么叫“和为贵”?因为既然都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打打杀杀呢?显然和睦、和谐、相互间的体谅这类品德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历史地看,和为贵、爱好和平这种思想,必然在华夏文明,尤其在中原一带这种文化当中产生出来。它不是从外国注入的。诚然,人生来就有权欲,就有征服欲,但也不是毫无解决办法的。通过一定的环境、条件,人的先天的

权欲会慢慢地激发出另外一种和它相生相克的关系,慢慢地把人性中某些过强的权欲、征服欲加以削减,使之被约束到一个比较能够被接受的程度。一种中庸形态的德行准则逐渐成形。但是单单这一点就很容易把中华民族和大多数的西方民族区别开来了。

如果说中国人生活在这个地方容易把天下太平作为一种理想追求的话,那么在西方世界情况就不一定了。西方世界的社会生活动态感强。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的农耕特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游牧业确实比中国要发达得多。游牧业的特点就是老动来动去的。放牧的时候,一个地方的草吃完了,不可能马上长出来,你就得不断地迁移。加上地中海一带的商业特别发达,假如你去经商,漂洋过海,显然不可能把一家老小都跟着迁走。这样的条件,促成对个人行为的自决能力的强化。很多人的冒险精神容易被激发出来,被熏陶出来。海上的贸易,面对大海,可以启示人思考自然力的狂暴,引起人征服自然力的雄心壮志。当然,这种自立、自决的行为方式和冒险精神也会从另一个方面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们乐于争夺各种生存资源如土地等,乐于争夺一些要害地点,如港湾、航路等等。英雄精神、骑士精神容易得到鼓励,于是发生战争的时间就特别多。所以西方民族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很突出。很多人问:individualism、好战性为什么会在西方特别明显呢?中国人当然也有这种东西,可总是受到压抑的,而西方民族那个东西非常鲜明。为什么?生存状态使然。有人说西方人好战成性,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他们那个好战的心理确实比中国人要强。就是号称爱好和平的伊丽莎白女王对于自己的臣民到海上去抢别人的船只,她都要表扬嘉奖的。她的将军在海上打劫了别国的商船成功凯旋,她是要分赃的。这类海盗行为她并不认为不好。在中国,你要那样去做的话,大家都要谴责你。那是不对的,是去抢劫别人。但是,他们觉得那是一种英雄行为。所以两个民族由于各自的生存空间条件陶冶出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当然,近几百年来,西方人也不断地试图压抑这种情绪,可是时起时伏,还只是压抑到了一定的限度。民族深层心理结构被客观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千年来的陶冶,把它模式化了,定型了,塑造了一种民族性格,是不可能一下就改正过来的。

我们还可以进而提出一个问题:儒家的思想为什么会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产生?因为儒家那一套思想,比方说扎根于周礼的那一套思想,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整套东西之所以会在中国文化中起那么大的作用,也是在相当的程度上由于上述的诸多地理环境原因所致。整个家族生活在一起,都是一家子,自然条件导致的生理、心理模式自然会对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产生水到渠成的定势作用。在一个家庭中父母最该受尊重,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